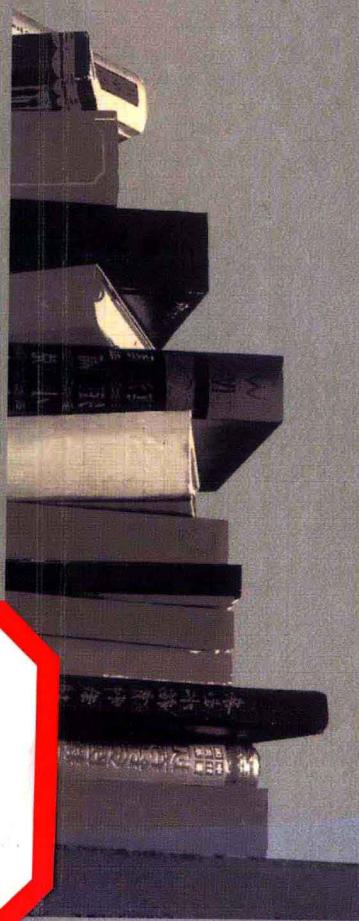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邵盈午 著

细羽长流

壬午年夏



B

JIANJIZHIYAN SHAOYINGWUZHU

邵

盈午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后言 编辑

文藏书章

盈午 邵
文藏书章

雅致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卮言 / 邵盈午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1

ISBN 7-5063-2945-X

I . 编… II . 邵… III . 编辑学 - 论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C.0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5778 号

编辑卮言

作者：邵盈午

责任编辑：林金荣

封面设计：小寰球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编辑电话：010-89501066

E-mail：hxhl@263.net

开本：787×1092mm 1/16

字数：380 千字

印张：18.5 印张

印数：01-5000 册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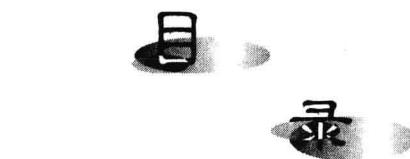
ISBN 7-5063-2945-X/C·0719

定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 ◆

早期学刊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繁盛	3
九域争传姓氏香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30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从南怀瑾的古文今译再论学术编辑的职能定位	46
鲁鱼亥豕为哪般	
——从《管锥编》的校对质量差错率高的原因探析	54
学报改革刍议	
论“图片”在学术著作中的独立话语价值	69
由时下的“辞书热”想到叶圣陶先生	75
柳亚子先生与编辑工作	80
魂牵万里一诗僧	
——兼谈柳无忌先生的编辑工作	87
我看“眼高手低”	93

第 二 编

柳无忌先生的一束遗札

- 《柳无忌邵盈午通信集》编后感言 99
 论范曾先生的文章家法
 ——《范曾散文选》编后记 130
 《文怀沙序跋集》编后记 146
 《文怀沙序跋续集》编后记 148
 《时有恒诗文选》序 150
 魏晋风流来腕底——范曾先生《竹林七贤图》序 154
 《范曾诗稿》序 157
 《范曾画集》编后记 160
 精微广大的经典文本
 ——范曾先生《庄子显灵记》注后记 165
 《南社人物吟评》前言 182

第 三 编

“最好站在读者的地位，多看几回”

- 忆叶圣陶先生 203
 不“作”一字亦风流
 ——记钱仲联先生 213
 绝学发微忍息肩
 ——记中华书局编审周振甫先生 228
 人淡于菊品逸于梅
 ——郑逸梅先生访谈录 244
 漫言为人作嫁衣
 ——叶至善先生访谈录 253

臧克家先生风景线	
——兼记作为《诗刊》主编的臧老与毛泽东的诗缘 259
史册千秋书大案	
——记作为“主编”的文怀沙先生与批判《红楼梦》运动	
 269
后 记 291

第一輯

早期学刊

中国现代学术的繁盛

在 19 世纪末,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因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的崩解塌陷而开始发生变化;或者说,近代知识者与传统文化结构之间的那种契合关系已不复存在,他们被投入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文化结构之中,并开始了艰难的选择。在这个历史转捩期,涌现出一批无论是学术积累还是文化融解力、担当力都堪称一流的大师巨子,从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

所谓中国现代学术,一般来说,是指清末民初以来,也就是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 20 世纪,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繁盛时期。至于现代学术这一提法,主要是相对于传统学术而言。从基本内涵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现代学术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有所认定,倾向于把学术本身当做学术研究的目的;二是学者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不愿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三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与方法,特别是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看待、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

以上述三点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学术,在其转型的过程中,早期学刊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说,无论是引进西学还是传输现代的学术思想,都须臾不能离开早期学刊这一传媒工具。至于文学社团的成立,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团体的兴起,更是以学刊为依托。本文拟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此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自 19 世纪初期始,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先进印刷技术的采用,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若进一步细溯其由来,实皆滥觞于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商人、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的

大城市出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教科书等各种图书,创办报纸杂志,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情势下,中国人(包括官府)也办起了自己的报刊,印行“西学”。如所周知,印刷术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然而,“印刷之精,至于尽善尽美,乃赖西国人士之改造”。具言之,中国向来专重木刻,其间虽有胶制活字、木制活字出现,但究以木刻为大宗。自西洋铅印、石印等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传统的木刻席位被取而代之,印刷事业的规模与面貌遂焕然一新。1857年,墨海书馆发刊的《六合丛谈》月刊,便是中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先进的印刷技术,无疑为中国早期学刊的刊行和文化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外商在中国经营出版企业,则进一步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出版业的改进和发展,新式印书局相继成立,各类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就为学者交流与发表学术见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客观上成为促进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当时的学术界、知识界,真正意义上的对西学有较多认识和了解的,当始于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和有计划、有系统地广泛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严复。梁氏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①基于此一识见,讲求实效的梁氏于1897年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作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力图使“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②。在梁氏的影响下,新的编译机构急剧增加,仅1901—1911年间,以“译”字为刊名的,便多达数十种,如《译林》、《新译界》、《励学译编》、《劝学译编》、《译书汇报》,等等。

与梁氏联袂致力于编译活动并卓有建树者,当推严复。严氏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或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因其“悯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遂发愿立誓,勉而为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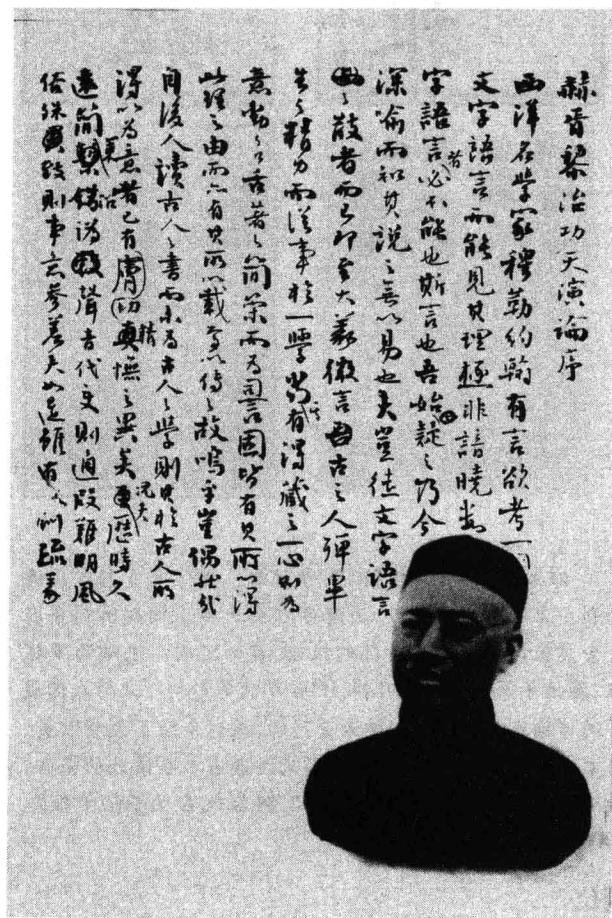


《六合丛谈》封面书影

^① 引自净雨《清代印刷小纪》,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353页。

^② 《西学书目表序例》。

他 42 岁那年(1895 年),便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四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他指斥秦以来的历朝历代国君、帝王是“在盗窃国者”,故必须废除君主专制,确立人民为主体,废弃八股,力倡新学,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使中国富强的最佳措施。在严复所发表的四篇政论文中,最足以代表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发展的,当推《原强》、《辟韩》,这两篇政论文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并命屠守仁作《〈辟韩〉驳议》,企图加以迫害。1897 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公开发表,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啻是掀起了一阵飓风;



严复为《天演论》所撰序言手迹,下图为严复像

与此同时,严复还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较早地提出了重视小说地位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天演论》、《原富》、《法意》等等,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大开风气之先,对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维新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以此为肇端,一股译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潮在国内盛兴起来。据统计,仅 1902—1904 年三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竟多达 136 种之多,有关哲学方面的达到 34 种,有关史地方面的多达 128 种。毫无疑问,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嗣后,由国人创办的学刊,便如箨笋般层出不穷,如《强学报》、《时务报》、《农学报》、

《算学报》、《工商学报》、《实学报》、《艺学报》、《新学报》、《普通学报》，大抵以一个“学”字冠名。此外，在当时影响甚巨的学刊还有：《东方杂志》、《政艺杂志》、《教育杂志》等。

1900年以后，学刊的数量进一步增多，题材范围和读者对象也更为广泛，如《新世界学报》、《政治学报》、《蒙养学报》、《政法学报》、《通学报》、《蜀学报》、《岭学报》、《女学报》、《北洋学报》等等，不一而足。据统计，在1898—1919年间北京报刊80余种，浙江60余种，武汉50余种，广东110多种，画报100余种，妇女期刊50多种，白话报纸170多种，科技期刊127种。^①

须着重提及的是，这些早期的学刊，虽然内容、特点各不相同，但对传播西方文化，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不惟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也呈空前之势。如果说，现代学术的转型，是与引进、吸收和融解外来文化分不开的，那么，作为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学术发展变化之产物的早期学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无疑应当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右上图为《农学报》创刊号封面。1897年5月在上海创刊。上海农学会主办，上海务农会出版。该刊所刊务农会会员采访各省农事情况的报告，最为可观。主编为罗振玉、蒋伯芹等。初为半月刊，1898年改为旬刊。此为我国最早的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专业刊物，该刊介绍了大量欧美、日本农书，而以所刊务农会会员采访各省农事情况的报告，最为可观。原名《农学》，第15期后改名为《农学报》。1906年1月停刊。

^① 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二

在 20 世纪初,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发生和发展)时期,确曾涌现出一大批学术上的大师巨子,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胡适、傅斯年、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陞、萧公权、唐君毅、梁漱溟、顾颉刚、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张君劢、张东荪等。他们以博古通今的学识,学贯中西的文化视野,将我国学术推向了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①。在这个现代学术的繁盛期,除了前面提及的严复外,王国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所周知,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过程所涌现出来的近代学人中,大多有着出洋留学的背景,较之宋儒和清儒,已有很大不同,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然而其中有不少学人的学术思想是坚实地立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他们一方面是西学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一方面又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现代理念渗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提倡新学的呼声沸反盈天的当时,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可贵的自觉,应当说是非常难能的。而在这方面,王国维最具代表性。



1901 年,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的物理学校研究物理,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其时,尼采的思想以及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大为盛行。王国维便自觉地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他们的学术经历介绍给国人。与此同时,王国维还翻译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1903 年),甚至把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也介绍到中国来,发表在《教育世界》上。

王国维前期小像

^① 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线索。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就是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又称汉学或朴学,即梁启超所说的盛清学术。而晚清又开始有新学。晚清新学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过渡期。中国学术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是一个高峰期。但乾嘉时期的学术,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师。



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王氏前期的哲学、诗学、教育论文等，大都发表于此。

然失色。以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实际上成为标志“新红学”的一篇开山之作（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要早 17 年），并名至实归地成为红学研究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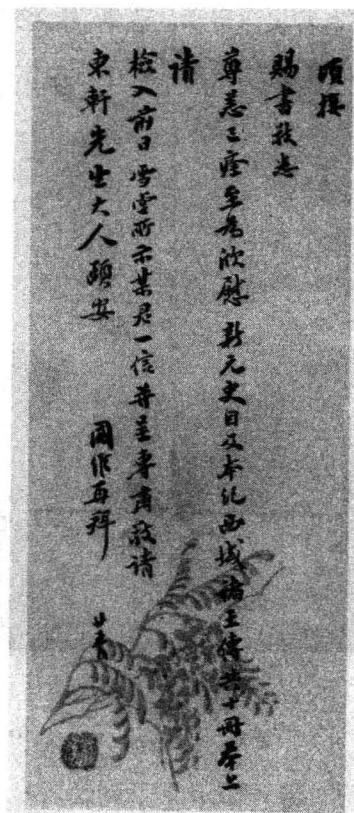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为《论性》，一为《释性》，均作于 1904 年，发表在《教育世界》上；还有一篇《原命》，作于 1906 年。这三篇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足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与新知完美结合。先请看王国维的下列主张——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

《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研究教育学及教学法的刊物，1915 年创刊。由罗振玉发起，王国维等主编。该刊以“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载各国良法宏规以次则效”、“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劝”为宗旨。在 1903 至 1904 年左右，该刊几乎成为发表王国维翻译作品的园地。

王国维还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 1904 年；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而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具体说来，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论述《红楼梦》的根本精神、美学与伦理学价值，此为嚆矢。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相比之下，旧式的所谓“索隐”“影射”“评点”一套，未免黯



王国维手札

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

这段文字是从王氏为其所编的《国学丛刊》撰写的序言中摘出的。《国学丛刊》于1922年创刊，由王国维、罗振玉主编。该刊以“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之潮流”为宗旨，内容分为八类：经、史、小学、地理、金石、文学、目录、杂识。我们仅从王国维为此刊所撰写的序言中，便可窥察出王氏已然打破了困惑当时诸多学人的中西、今古、新旧的畛域，可视为是一种从理性认知上开启现代学术枢纽的心态先声。至于他用一个“大”字概括清初学术，用一个“精”字概括乾嘉汉学，用一个“新”字概括晚清之学，更是目光如炬，其中有万不可移易者。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王氏最推崇的，则是“自来学者所未及”的沈曾植。

在学界，沈氏无疑堪称为一流的“硕学通儒”。他秉承章学诚一派的学脉统系，邃于四裔碑铭之学^①，卓有建树。胡先骕说他是“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或未之先也”。此语洵非虚誉。他擅语学，精律学，治西北舆地，著有《元秘史笺注》15卷、《蒙古源流笺注》8卷^②，书法亦擅盛名。在当时可谓



沈曾植全身像

^① 所谓碑铭之学，系指《唐阙特勤碑》、《突厥必伽可汗碑》、《九江回鹘受里登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的“三碑”考察。沈氏以此为据，纠正了新、旧《唐书》的诸多错误，并以现代蒙古语粗略解读了“三碑”辨隔难通之处。

^② 《蒙古源流笺注》乃沈氏最具影响的重要著作之一。康熙元年成书的《蒙古源流》一书在辗转抄录、流传中出现了蒙、满、汉三种文字合抄的版本。因涉及到语言学、元朝史、蒙古史与地理等诸多学科，一直倍受学者关注。从钱大昕、纪晓岚、魏源、张穆、何秋涛到洪钧、李文田、屠寄等清代著名学者，皆对《蒙古源流》贡献了不少劳动，贡献颇多。而沈氏认为上述学者，“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学术界公认若研究《蒙古源流》，“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故对沈氏的这部《蒙古源流笺注》极为重视。但沈氏的这部书在他生前并未刊布面世，其遗稿后来由沈氏其子沈慈护交给父执张尔田、王国维整理。张尔田在为该书所撰的序言中慨曰：“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总之，沈氏的这部《蒙古源流笺注》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乃晚清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直接开启了民国初期在该领域的研究。

名震海内，冠绝群贤，连大名鼎鼎的王国维、伯希和都曾登门求教。他在京师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的《蒙古图志》中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必伽可汗碑》、《九江回鹘受里登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大有当面鼓对面锣地考量一番的意思。沈氏遂濡笔写就三篇精妙的考证性跋语，使得俄国人为之瞠目，不得不慨然道：“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这不啻是为中国学人撑足了面子。

佛学，更为沈氏所精擅。王蘧常在《沈寐叟先生年谱》中云：“公梵学最深，始业当在四十前后”。我们从他的《海日楼札丛》中可以看出，他很关心早期佛教史，对大众部所依经典、大众部的大乘思想、马鸣与婆须密迦旃延子的关系，均有着全然不同于传统佛教的论述。在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上，他也堪称是以现代学术思路予以探究的前驱，难怪乎当俄国哲学家伊萨林在辜鸿铭的引介下拜会了沈氏后，竟撰文将其赞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最能充分体现王国维对沈氏的认识的，当推他为沈氏 70 大寿呈献的那篇序言。原文较长，兹撮其要者而录之——

.....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咸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之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眇，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为古圣贤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品类不同，



王国维壮年小像

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窃尝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使伏生、浮丘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帮，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有验于今

……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已未二月，先生年七十，因书先生所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并使世人知先生自此以往，康强寿耆，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矣。^①



完整的甲骨文片

在王氏看来，沈氏所谓“秉先正成法”、“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实即指一种学术范型。如果我们把学术视为人类的理性之光，一种人类高度自觉的复杂的精神活动的话，那么，所谓学术研究，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则，进行专门研究，以期得到系统性或体系性的知识真理。至于学术范型，则是指某个时代、某个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带有规范性的型态。它大体表现为：以什么哲学、理论为基础，有怎样的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研究技术路线，使用什么样的学术语码，那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是在什么内在机制下提出的，等等。这

^①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本文作于1919年，收入《观堂集林·缀林》；又见于《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一卷，第97页。